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 survey of Malaysian young Chinese in Rawang, Selangor**

**Chinese in Rawang, Selangor**

by

LAI FooFat

B.A. (University of Malaya) 2006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Literature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Supervisor

Professor PENG Lanyu

April, 2014

# 湖南大学

##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湖南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保密 ，在\_\_\_\_\_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 2、不保密 。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内打“√”)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 摘要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语言的国家。特殊的多元化历史背景，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内部方言多样化的既定情况，促成了马来西亚独特的多语环境。在马来西亚使用的语言主要有马来语、英语、华语、泰米尔语等。由于不同语言的长期接触，逐渐形成多语混杂的掺杂式语言，从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语言景观。

本文依据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理论，以问卷调查法，研究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万挠的年轻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首先，从语言态度的概念入手阐述了研究的价值，并简要介绍了语言态度的主要方法，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语言态度及相关语言现象的研究。同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意义。其次，着重阐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语言背景。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从华人奋力捍卫母语教育的情况可见，马来西亚华人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秉持着坚韧的态度。语言地位随着社会的改革发展而产生了变化，科技的发达、教育制度的改善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影响了语言使用情况。再次，对雪兰莪州万挠年轻华人语言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像绝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一样，雪兰莪州万挠年轻华人，都具有多语能力，他们从小就接触多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方言，这使得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极为复杂。最后，则是探讨雪兰莪州年轻华人的语言态度与看法。在情感方面，他们对华语较有认同感；在功利方面，他们则较认同英语，他们已摒弃老一辈华人所保持的“方言情结”。与此同时，雪兰莪州年轻华人也逐渐接受和使用掺杂式语言，并认为这是当地的一种语言特色。

对雪兰莪州年轻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的研究，可以对马来西亚将来一段时期内的语言发展趋势作出初步预测，并为多语教学研究提供一个在多元化环境下语言观念和语言使用的典型例证。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人；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调查

**Abstract**

Malaysia is a multi-ethnic, multi-cultural and multilingual country. The special multi-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diversity of internal dialects in Malaysian Chinese society contributed to Malaysia unique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The main languages used in Malaysia are Malay, English, Chinese and Tamil. Due to the different language contact for a long time, a multilingual hybrid mixed type of language had been formed, and a unique landscape of language has established.

This study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theories in the field of sociolinguistics.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in a survey, investigated the language usage and language attitude of the Malaysian young Chinese in Rawang, Selangor. First, this thesis begins from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attitude, explains the value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main methods of language attitude was briefly introduced. Second, a review into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language attitudes and related language phenomenon was don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meaning are also introduced in this thesis. It is followed by the focus on Malaysia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language backgroun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from the situation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defend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Malaysian Chinese in terms of inheriting the national culture adhere to the tough attitude. With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language status has changed.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which affects the usage of language.

The language usage of thousands of young Chinese in Rawang, Selangor was analyzed. Like most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young Chinese in Rawang, Selangor possess multi-lingual ability. They have kept in contacts with a variety of languages, including Malay, English, Chinese and other dialects since young, which made their language usage very much complex. Finally, language attitudes and opinions of young Chinese in Rawang, Selangor was discussed. In the emotional aspects, they feel more passionate towards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erms of utility, they agreed that English language played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However, this younger generation seemed to reject the "dialect complex" as compared to the older generations. Meanwhile, young Chinese in Rawang, Selangor also gradually accepted and adopted a mixed language



usage, and held the opinion that this is a kind of local language feature.

This study of language usage and language attitude of young Chinese in Rawang, Selangor, can provide a preliminary forecast the milestone of Malaysia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 trend in the future. In conclus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n empirical example of language concept and language usage in a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study adds to the body of knowledge for the teaching of multi-lingual.

**Key Words:** Malaysian Chinese; Language Use; Language Attitude; survey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	I
摘要 .....	II
Abstract .....	III
目录 .....	V
图表索引 .....	VII
<b>第1章 绪论 .....</b>	<b>1</b>
1.1 研究缘起、目的、意义 .....	1
1.2 研究综述 .....	3
1.2.1 学界关于语言态度的研究现状 .....	3
1.2.2 马来西亚语言现象的研究现状 .....	5
1.3 有关概念的界定 .....	6
1.3.1 华人 .....	6
1.3.2 华语 .....	7
1.3.3 方言 .....	7
1.3.4 语言态度 .....	7
1.4 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	8
<b>第2章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语言背景 .....</b>	<b>10</b>
2.1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背景 .....	10
2.2 马来西亚主要语言的背景与地位 .....	14
2.2.1 马来语的背景与地位 .....	14
2.2.2 英语的背景与地位 .....	15
2.2.3 华语的背景与地位 .....	16
2.2.4 泰米尔语的背景与地位 .....	17
<b>第3章 马来西亚年轻华人的相关背景与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b>	<b>18</b>
3.1 调查对象的相关背景 .....	18
3.1.1 调查对象的个人背景 .....	18
3.1.2 调查对象的语言背景 .....	20
3.1.3 调查对象的语言能力自我评估 .....	21
3.1.4 调查对象的主要生活用语 .....	24
3.2 调查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 .....	25
3.2.1 调查对象与不同交谈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 .....	25

3.2.2	调查对象在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 .....	28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3.2.3	调查对象在各种活动中的语言使用情况.....	30
N IDRIS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第4章 马来西亚年轻华人的语言态度调查分析.....	35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4.1	调查对象对马来语、英语、华语与方言的评价 .....	35
4.2	调查对象对掺杂式语言的看法和态度.....	37
4.3	调查对象对学习华语原因的看法 .....	40
4.4	调查对象对学习方言原因的看法 .....	41
结语 .....	47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参考文献 .....	49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致谢 .....	52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附录 调查问卷 .....	53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图表索引**

图 3.1 调查对象最早在家里接触的语言 .....	20
图 3.2 调查对象的主要生活用语 .....	24
图 3.3 调查对象与不同交谈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 .....	25
图 3.4 调查对象在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 .....	28
图 4.1 调查对象对马来语、英语、华语与方言的评价（情感方面） .....	35
图 4.2 调查对象对马来语、英语、华语与方言的评价（功利方面） .....	36
图 4.3 调查对象使用掺杂式语言的比例 .....	38
图 4.4 调查对象的掺杂式语言使用特征 .....	38
图 4.5 调查对象使用掺杂式语言的原因 .....	39
图 4.6 调查对象对学习华语原因的看法 .....	41
图 4.7 调查对象对学习方言的看法 .....	42
图 4.8 调查对象对学习方言原因的看法 .....	42
图 4.9 调查对象对不要学习方言原因的看法 .....	43
表 1.1 马来西亚华人方言群人口及分布情形 .....	1
表 3.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18
表 3.2 调查对象学习说各语言的场所 (%) .....	21
表 3.3 马来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 .....	22
表 3.4 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 .....	22
表 3.5 华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 .....	22
表 3.6 方言的听和说能力 (%) .....	22
表 3.7 调查对象各语言听说读写能力的平均值 .....	23
表 3.8 马来语在 8 种活动中的使用程度 (%) .....	30
表 3.9 英语在 8 种活动中的使用程度 (%) .....	30
表 3.10 华语在 8 种活动中的使用程度 (%) .....	31
表 3.11 调查对象在 8 种活动中各语言使用程度的平均值 .....	33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目的、意义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约有 30 多个种族，但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三大种族组成。根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报告结果，马来西亚总人口有 2833 万 4135 人，其中马来人有 1419 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54.6%，华人有 639 万人，占总人口的 24.6%，印度人则有 190 万人，占总人口的 7.3%。<sup>1</sup>马来西亚主要的语言是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

国家官方语言为马来语，英语为通用语言及官方认同的第二外语，华语则通用于华人社会，泰米尔语仅通用于印度人社会。其中华人之间有方言，如闽南语、客家话、粤语、潮州话等。多元种族造就当地社会的语言多元化，语言并存与交替，在马来西亚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马来西亚的华人母语多为华语和方言，他们基本上会讲三种语言或以上，因此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值得探讨。

根据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2008 年 1 月 5 日的一篇报道，估计目前马来西亚华人方言群人口及分布情形如表 1.1。

表 1.1 马来西亚华人方言群人口及分布情形

籍贯	估计人数	比率	主要聚居城镇
闽南(通称福建人)	210 万	35%	槟城、雪兰莪(巴生)、马六甲、柔佛(麻坡、峇株巴辖、昔加末、居銮、新山)、吉兰丹(哥打峇鲁)、砂拉越(古晋)
客家	144 万	24%	霹雳(怡保)、吉隆坡、雪兰莪(沙登)、槟城(亚依淡、浮罗山背)、吉打北部(章仑)、森美兰(芙蓉、知知港)、沙巴
广府(通称广东人)	108 万	18%	霹雳中南部(怡保、金宝、美罗)、吉隆坡与雪兰莪(巴生河流域)、森美兰(芙蓉)、沙巴(山打根)

<sup>1</sup> (马来西亚) MID-YEAR POPULATION ESTIMATES BY ETHNIC GROUP AND SEX [EB/OL]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www.statistics.gov.my, 2009/10/09.

潮汕(通称潮州人)	66 万	11%	槟城(大山脚、峇眼色海)、雪兰莪(吉胆岛、适耕庄)、柔佛(新山、笨珍)、砂拉越(民都鲁)
闽东(通称福州人)	30 万	5%	砂拉越(诗巫、美里)、霹雳(班台、实兆远)、柔佛(永平)、森美兰(武吉不兰律)
海南	24 万	4%	散居于以下州属(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吉兰丹、登嘉楼)
广西	9 万	1.5%	彭亨(文德甲、文冬、劳勿、立卑)
其他	9 万	1.5%	
总计	600 万	100%	

表 1.1 的数据不仅对方言区分布进行了表明，同时，也说明华人除了掌握三种语言之外，方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此种语言现象是由于家庭背景、学习教育、语言环境等不同而造就的。洪丽芬 (2007) 认为，在平时的生活中，一般，同一籍贯的华人均是讲方言。如果华人并不来自同一籍贯，那么，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会根据文化程度、教育背景、交往习惯而定，另外，与方言是否强势也具有重大关系。在交流时，他们可能会选择英语、华语或者方言。虽然如此，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群，基本上都会面对“被华语化”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对所有的华人方言群是一致的。虽然没有详细的调查资料，不过多年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的学者 Carsterns (2005) 相信，在马来西亚，使用粤语、闽南语与潮州话进行国内与国际贸易的华人家庭，基本上比较少会让华语取代掉他们原本的母语，因为这些方言与他们的商业网络密不可分。

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及多语接触的社会环境的背景下，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呈现出一幅纷繁交错的情景。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英语也通用，华人融合在其中，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华人已经植根于马来西亚社会，华人与华人之间的交际语言是什么呢？经过三、四代的融合，新生代华人对各语言的掌握能力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同时，马来西亚的语言与教育政策等对于语言态度又有什么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日益强大，“汉语热”在全球逐步兴起，中马两国在经贸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汉语热”对华人在语言使用和态度上有什么影响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刻地考察。

本文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年轻华人这一特定群体上，这是因为年轻华人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他们正处于特殊的成长阶段，对年轻华人的语言态度进行调查可以窥见社会语言生活之一斑，并可对将来一段时期内的语言发展趋势作出初

步预测。此外，研究年轻华人当前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就是关注今后马来西亚的语言发展趋势，同时也为多语教学研究提供一个在多元文化环境下语言观念和语言使用的典型例证。

随着海外各地华人的交流日益增多，各地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和中国的语言生活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各地华语间的互动加速，这意味着观察和研究中国的语言生活不能不考虑海外华人这个特殊群体。近年来，对海外华人社会生活的研究一直是个热点，中国国家语委海外汉语研究中心把华人社会语言生活状况调查作为重要研究课题。华人对华语的使用情况及态度如何，关系到华语在全世界的推广、使用和发展。

## 1.2 研究综述

### 1.2.1 学界关于语言态度的研究现状

在社会语言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即为语言态度。关于语言态度的研究成果，当前国外进行了不少积累。从西方国家所作的相关研究来看，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学者们才对此进行研究。在研究上，主要集中于非标准语和标准语的差异性及使用者的态度和语言能力等层面。在此过程中，颇为重要的是 Lambert (1963) 关于语言态度的调查；Bourhis (1982) 考察加拿大及之外地区（法语区）和变体语言的态度，并结合相关的语言政策；Edward (1982) 研究了不同区域、国家、种族或阶层关于英语的语言态度；Garcia (1988) 运用社会语言学调查问卷的方法，考察两个在纽约市使用西班牙语的社团其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Woolard 和 Gahng (1990) 考察了巴塞罗那地区人们对语言变体的态度分层与演变。

中国国内在对语言态度进行研究时，专门性的著作比较少，涉及到研究语言态度的著作和论文却不少。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定义语言态度及影响的因素。如郭熙 (2004) 在《中国社会语言学》中，对于语言态度和语言观等问题，均作出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和描述；戴庆厦 (1993) 在《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态度的影响因素、制约因素、表现形式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宁春岩和桂诗春 (1997) 在他们的作品《语言学方法论》中，论述了语言态度和语言态度的向外延伸；孙汝建、王德春和姚远 (1997) 在《社会心理语言学》中，对态度和语言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项介绍；王远新 (2002) 著《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中对于调查和研究语言态度的方法体现了心智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主张。游汝杰、邹嘉彦 (2009) 著《社会语言学教程》中谈到了决定语言态度的几个因素。孙咏梅、孙咏莉 (2007) 的《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和影响他们

语言态度的相关背景。

第二，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谈语言态度。如倪传斌、王志刚等（2004）在《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态度调查》一文中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言态度作了调查。杨玲（2001）的《四川方言区在校学生的语言态度分析》一文分析了四川方言区在校学生的普通话能力及他们对待普通话和方言的态度。

第三，少数民族语言态度调查。如王远新（2002）著《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邬美丽（2009）《在京少数民族大学生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调查》、王洋（2004）《新疆维吾尔族语言态度探析》、李伟（2009）《新疆维吾尔族初中生语言态度、语言焦虑的研究》、刘玉屏（2010）《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闫丽萍（2002）《新疆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双语态度的调查与分析》等。

第四，不同的语言态度在语言使用、变化以及语言能力上所产生的影响。如刘虹（1993）就语言态度为语言使用和语言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专门作文进行了论述，表明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人们的态度会影响到语音变项的选取。陈松岑（1991）分析了新加坡华人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的影响，其在文中调查了华人的语言态度，对语言的使用和语言能力进行了探讨。文中认为新加坡的华人在其语言态度上和语文能力会影响到他们对方言，英语，华语的使用，也会影响到新加坡华人学习英语和华语的积极性，并从他们的语言能力上反映出来。

第五，语言态度的构成因素。如万明钢（1996）在《双语态度及其研究策略》一文中探讨了双语个体心理结构的一个侧面——双语态度，通过对双语研究策略的评述，进一步分析双语态度的结构及其形成机制；龙惠珠（1999）的《从职业背景看语言态度的分层》以地位价值以及亲和力为理论基础，对香港人关于普通话的探讨，同时还研究了他们对将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这三种不同语言的态度，并从语言的价值地位和亲和力这两方面着手，展开分析；高一虹、苏新春、周雷（1998）对回归前香港、北京以及广州的语言态度进行了研究，在文中对这三地人们的语言态度进行了实证调查。

以上是对学界近些年专家、学者关于语言态度方面的研究成果的综述，可以看出对语言态度的研究从宏观角度的理论性支持到微观角度的个案实施；从调查对象的地区差异到深层角度的背景剖析，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语言态度调查问卷、配对变语法等可靠的手段对语言态度以及影响语言态度的因素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分析是可行的，也是有实践意义的，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1.2.2 马来西亚语言现象的研究现状

虽然有关马来西亚华人语言现象研究的著作或论文很早就有，但关于马来西亚年轻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的研究并不多见，但相关研究的文献比较常见。

李如龙（2000）在《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一书中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生活及其历史背景》一文，初步分析了马来西亚华人的社会语言使用的状况，但并未涉及语言态度的调查。

郭熙（2003）的《马来西亚槟城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一文描写与介绍当地华社的语言生活，在具体结合各方面的背景资料进行论述方面有待深入探讨的空间。

黄敏（2004）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语言中的语码转换现象》主要论述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三地的语言特征及语码转换现象。但作者提出产生语码转换的观点只是以局外者看待这三地语言社会表面层，没有具体对这三个地方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及了解，对于马来西亚部分更是出现错误。她大略将三地产生的语码转换并列一起，忽略了这三地社会形成的政策与当地人民语言使用背景，造成可信度降低。

郭熙（2005）的《马来西亚：多语言多文化背景下的官方语言的推行与华语的拼争》是从马来西亚官方语言的发展政策来谈论马来西亚的华语其发展现状。作者运用了相关的背景资料来说明和反映华语的发展在马来西亚正艰难地维持着，并且前景不甚乐观。

洪丽芬（2006）在《马来西亚社会变迁与当地华人语言转移现象——一个华裔的视角》一文，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并结合了历史、语言和社会三方面的范畴进行研究。作者持宏观的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华人的语言种类转移进行了探讨；同时也持微观的角度，深入调查马来西亚相同家庭中老中青三代，以共时研究手法，探索三个年龄层的语言选择演变，其中包括了他们的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的调查。

洪丽芬（2007）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马赛克现象——语言融合的表现》通过问卷法和访谈法调查吉隆坡城市家庭三个不同辈分和年龄层的代表，即祖父母辈、孩子辈、孙子辈，以了解马来西亚老中青三代华人语言混用的情况。

许丽珊（2008）在《多语接触下马来西亚华人的语码转换研究》研究了马来西亚华人语码的转换，并采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在多种语言运用状况下的马来西亚华人（槟城州）的语码转换。研究主要依照当地华人的社会语言使用习惯，对多语接触、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码转换展开探讨。此外，语言态度还可当成副

线，就语言态度对语码转换内在的影响进行探析。

许丽珊与赵亮（2011）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槟城州）青少年语码转换的社会表现。表示此地的马来西亚华社语言生活尤具代表性，并对当地青少年（华人）的语言生活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语码转换的影响因素涵盖了以下 5 个方面：语言态度、交谈对象辈分、场域变化、语言地位背景和交谈语境。

林采淇（2012）在《马来西亚华裔语码混用现象探索》一文中，以在北京的马来西亚华裔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录音方式，对在转写的语料中出现的语码混用现象进行探讨。

综合上述的文献回顾，可见马来西亚华人特殊的语言生活近二十年来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海内外的学者纷纷展开了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关研究从早期以考察和描写当地华人的语言情况为主，发展至今已有学者开始向社会语言学的方向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转用、语码混用现象。对于马来西亚华人语言态度的研究，虽然少数学者已经进行探讨，可是不够深入，而且皆以城市地区为研究范围，缺少了对市区以外的研究，不能全面叙述马来西亚华人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的现象。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加上前人研究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万挠年轻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及语言态度，为有关研究提供一份详细的样本。

## 1.3 有关概念的界定

### 1.3.1 华人

历史学家王赓武（1994）认为，当我们谈到“华人”时，该词语所指代的意思为：居住在中国领土之外的地区，即为居住在台湾、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之外的华裔。在很久以前，这些华裔大部分属于侨居者，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他们开始变成当地公民，这是一种非常新型而且比较重要的历史现象。“华人”则是用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华裔公民。在本文里尤指住在马来西亚，拥有当地国籍的非中国公民，或有华人血统的华裔。随居住国的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各国的华人都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文中实地调查部分的调查对象不包括混血华人和峇峇娘惹族群。<sup>2</sup>

<sup>2</sup> 峇峇娘惹族群，或称海峡华人。海峡华人的祖先可追溯自 16 世纪马六甲的华人和马来人。他们的有许多是马来人母亲所生，但不是穆斯林，主要接受英语教育，母语是马来语、英语，以及变异了的闽南语。海峡华人还秉承中华文化，但深受到西方文化和马来文化的熏陶，是文化

UNIVERSITY 认同相当特殊的华人。峇峇娘惹族群奉行的是传统的华人生活习俗礼仪，说的是马来语，接受 PENDIDIKAN DRIS 是英语教育，所以说是三种文化的结合体。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NIVERSITI PEN

### 1.3.2 华语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NIVERSITI PENDID

N IDRIS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IDRIS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IDRIS UNIVERSITI P

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称为“普通话”，“普通”的意思是“普遍”和“共通”，也是中国的通用语。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它被通称为“华语”，也是华人社区对汉语通用语的称法。新加坡语言学者卢绍昌（1984）指出，“华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在独立运动期间产生的新名词，流行起来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华语”一词的使用，说明这种以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语言是在中国海外地区流行的，同时它比较不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毕竟会讲华语的人并不一定是汉族人。

马来西亚华人使用的华语虽然是以汉语普通话作为规范，但是它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具有马来西亚式的一些特征，这是因为受到语言本土化的影响，以及经过多语接触的必然结果。

### 1.3.3 方言（dialect）

方言在本文指的是马来西亚华人方言群的地域语言。华人移民从他们的祖居地的汉语方言带到马来西亚后，方言的发展因为与中国原地的汉语方言演变速度和方向不一样，加之各籍贯华人移民因各种因素逐渐杂居，交往频繁，方言之间也互相融合与局部更替，结果产生了与中国大陆大不相同的方言。

### 1.3.4 语言态度（language attitude）

语言态度是人们对特定语言和文化的心理意向或感受，是人们对语言的评价，也是社会心理的反映。不同的学者对语言态度的解释所持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是该语言在人们心目中的主观印象。语言态度牵涉到语言的社会心理范畴，是人们语言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态度的形成是由多种社会和心理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不同的因素之间彼此存在着难解难分的联系。”听话人或者说话人，在听到某一语言或者谈论某一语言时，在感情和情绪上均有所感受和反应，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现象。这类属于情感上的语言态度，往往与说话人或听话人从小成长的语言环境、文化传统乃至个人生活上的特殊经历有关。说话人或听话人对特定语言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地位也可能持有理性的评价。这种理性的语言态度表面上是主观的，但在实际上不能不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这主要取决于语言在使用中的功能，以及它可能附加给说话人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关于语言态度的认识，西方的语言学家主要具有下述二种观念：其一为心智主义；其二为行为主义。所谓心智主义语言观即为将语言态度当作准备态度，认为其属于一种中介变量，会对语言行为人产生刺激或者影响。同时，也意味着语言态度属于一种内部状态，是由外在刺激所引发的，对于机体随后产生的反应，其充当了中介角色。一般情况下，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普遍表示，所谓语言态度，

就是语言行为人评价某种语言变体或对其表示的倾向，主要可划分为以下3个成部分：1. 认知；2. 情感；3. 意向。认知，即语言行为人对某一语言变体产生的理解和认知，或赞成与反对；情感，即语言行为人对某一语言变体产生的情感，包括对此种语言变体或喜欢或厌倦或尊重或轻视的行为；意向，即语言行为人对某一语言变体产生的行为倾向。持行为主义观念的学者则表示，人们对社会环境的态度是语言态度的唯一反应，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此观点持有者只要求对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进行调查，在观察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归类和分析，而不要求调查对象的自我报告和调查者做出间接的推断。

## 1.4 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

本文考虑了个人研究的条件，结合前人研究，把研究的对象确定为在雪兰莪州万挠居住的90后年轻华人，他们从小就接触多种语言，包括华语、方言、马来语和英语，甚至泰米尔语。

“90后”指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群。他们思想开放、个性张扬并富有创新精神，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的一类特殊年轻群体。90后一代求新求异、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特点也体现在语言的使用和态度上。

对于研究对象的范围设定在雪兰莪州万挠，乃因它是马来西亚早期最多广东人与少数福建人的落脚地，至今还是以华人占绝大多数并有百余年历史的小镇。再者笔者生活环境在那里，对其相当的了解，因此更能准确地掌握相关的背景进行论证。此外，由于之前的相关研究皆以城市为调查范围，缺少了对市区以外的研究，不能全面性的反映马来西亚华人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的现象。

常用的搜集言语资料和态度资料的方法有几种，为了保证调查材料的准确性和代表性，笔者选用了问卷调查法。问卷法是用书面形式进行调查的一种常用方法。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把调查项目转换成一系列问题，编制统一的问卷，向特定的对象做调查。因此，这是一种有结构的书面调查形式。与其他方法相比，它的最大好处是具有统一性的特点，即所有调查对象都采用同一份问卷，问卷所列问题对每一个调查对象都是一样的。这种方法不仅便于操作，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在较短的时间里能够获取大量的材料和数据，并且便于做定量分析，而且其准确性和代表性都比其他方法要高。再加上调查对象对自己的语言使用情况和态度最为了解，这将使调查结果更具有普适性。

问卷调查的问题经过谨慎地设置，所收集到的资料能够涉及到有关语言分析的多个层面，例如调查对象的语言态度和自评的语言能力，通过这些数据的掌握将有助于我们对有序异质的语言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笔者根据下列四个方面来设计调查问卷的题目：

(一) 第一部分是有关调查对象的个人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职业和他们的籍贯。

(二) 第二部分是有关个人语言使用的调查。问题的内容包括他们对本身的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方言的能力评估，与不同对象沟通时经常使用的语言，还有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和各种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等。

(三) 第三部分是有关掺杂式语言的调查。问题的内容包括他们是否经常使用掺杂式的语言，有关掺杂式语言的特征，以及对使用掺杂式语言所持的态度。

(四) 第四部分是个人对问题的内容包括他们对本身的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方言的态度，主要针对情感和功利这两方面进行评估。

整份问卷共有 26 道问题，有些题目当中再分成若干小题。笔者在进行正式的问卷调查之前，先让几位属于不同年龄阶层的 90 后调查对象进行试验性的调查，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反馈，对问卷题目进行了修订，例如有些问题的内容不太明确，所用的语句较难理解，因此须修改得浅显些，以避免引起歧义，从而使调查对象能够清楚作答。整个调查工作为期两个月，发出的 500 份调查问卷总共回收了 488 份，回收率高达 97.6%。

问卷收集好后，我们将每份调查问卷都进行统一编码，然后把所有的资料输入在微软 Excel 的文件档中，以方便整理和统计工作。统计资料是本文撰写的主要资料，笔者在对有关资料进行分析时，主要依据具体的情况来选用最适当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以符合科学分析的原理。因此笔者选用统计软件 SPSS 第 21 版来处理和分析调查数据，以确保统计数据的精确性和可信度。

我们采用统计学的原理，配合现代电子化的信息处理技术，对大量的调查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总结成果，这有助于我们了解目前马来西亚 90 后年轻华人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实际状况及其语言态度。

## 第2章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语言背景

语言和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政府的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人们的语言使用情况。因此，要探讨马来西亚华人语言使用情况，就有必要了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语言背景。

### 2.1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背景

19世纪至20世纪初叶这段期间，由于英殖民政府着手开发马来西亚的资源需要大量劳工，而中国又适逢内忧外患极端严重的时刻，农村经济崩溃，列强加紧侵略。在此求供相需的情况下，造成华人大量移入马来西亚境内，于是掀起了巨大的移民浪潮。

华人移入马来西亚之后，胼手胝足，从事开采锡矿，种植树胶和胡椒等各种经济活动。有鉴于华人一向重视教育，故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尽其所能，把在当地取得的财力，适当地用来兴建华文学校，努力办好华文教育事业，以栽培子女成材，并希望他们有机会接受华文教育，能传承中华文化。这就造成了马来西亚境内华人聚居的城镇，处处可见到弦歌不辍的华文学校景象。

19世纪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只是中国旧式教育的延伸。当时传授华文教育的场所大致可分为三种：

- (一) 当地富裕华人为其子孙开设的教馆或坐馆，一般请教师到家里教授；
- (二) 个别教师在自己家里设学传道授业，即所谓家塾或私塾；
- (三) 某些社群按一定规章创设的义学或义塾。

早期的华文学校多数设在环境污秽，空气欠流通，光线不足的地下室、附属小屋、阁楼、会馆、宗祠庙宇、医院或另外别的简单建筑物中。教师也不充足，一般，只要是能识字的人即可担任教师。教师队伍中，广泛包括了书信代笔人、书记、算命先生、落榜秀才、江湖郎中等可顺畅讲和写的人士。在课程的设置方面，则包括了书法、珠算、《孝经》、《千字文》、《三字经》、《幼学诗帖》等，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使用方言。

由于华文教育不符合英殖民政府的意愿与利益，因此政府从来不认真考虑为华人设立华文学校，也不认为设立华校是他们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兴办华校的重任便落在华人社会的肩头。英殖民政府对发展初期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态度是放任，漠视与看轻的，但也不严加干预。

步入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于中国辛亥革命（1911）成功，随着新政府的建立，旧的政策被推翻，这是中国本土固然洋溢着新思潮新气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受到这股新潮强流的吹袭和激荡。于是华人兴学之风更盛，大家出钱出力，

纷纷设立华校，使华文教育到处充满欣欣向荣景象。

此外，中国 1919 年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新文化思潮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各地的华文小学在五四运动之后，都纷纷将华文课本由文言文改成白话文，教学媒介语也由方言改为华语。加上课程及设备等方面都有改进，而且增授英语等实用科目。这些措施使得华校毕业生颇能适应马来西亚的环境，切合华社需求，因此得到华人大力支持。大批的华人选择将子女送入华校就读，遂使一些地区的英文学校人数有下降之势。

华校学生人数的激增现象不是英殖民政府所乐于看到的，因为华文教育非英政府规划下的产物，同时华文教育的突飞猛进也展现了华人势力的滋长，英殖民政府不免有难以驾驭之隐忧。面对此种事实，惟有想出一些约束之法加以控制。同时，又适逢本地华人受到中国大变动的影响，曾经进行反日示威游行和以实际行动表示对英殖民政府的不满等。在这些行动中，华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表现得异常活跃，于是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更加警惕，终于在 1920 年 10 月 29 日颁布了《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Registration of Schools Ordinance 1920)。这项法令表面上虽谓用来管制所有学校，实际上乃蓄意控制华校，阻止华校师生参加有关政治的活动，以免危害英殖民政府的利益。

《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要求法令实施之前或之后所创办的学校都须进行注册，并言明若此法令推行之后三个月而学校尚未取得当局所发出的注册证，则该学校即属违法。与此同时，所有学校的教员及管理者也须进行注册。凡是进行损害英殖民政府及公众利益的政治宣传活动的学校及教员，政府可宣布为违法并取消其注册证。

由于英殖民政府颁布《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其矛头乃指向华校，意图将华校加以管制。这种做法很明显的是防止华校从事宣传政治意识看得比提高教育素质更为重要，因此引起华人社会普遍不满与反感，于是大家交涉请愿，抗议反对，不一而足，这些行动并未收到任何效果，华校只得勉强依令注册。

1941 年底马来西亚被日本占领，由于华文教育背景的人士具有强烈的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及反日思想，日军对这些人早有戒心。他们一占领马来西亚之后，便对华教人士进行迫害，无数的教师和学生惨遭杀死，幸而逃脱的也四散避难。华校有的横被兵燹，有的遭到日军占领，改为兵营民房。因此日治时代马来西亚境内的华校大部分都关闭停课，奉日军之命而开办的寥寥无几。

日本于 1945 年 8 月投降之后，英国人又回到马来西亚恢复其殖民统治。这个时候，在政治上，英国人计划将海峡殖民地三邦之一的新加坡分割出去，使其成为皇家殖民地 (Crown Colony)，而把槟城和马六甲与马来联邦及马来属邦合组成马来亚联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1948 年 2 月 1 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确立。光复后，马来西亚各地的华人纷纷复办华校，于是华校再度迅速地在马来西亚境

内复兴起来。

从 1946 至 1956 年之间，由于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教育政策也随之频频修改。因此在这 10 年里，马来西亚出现多份有关教育的报告书和教育法令。这些报告书和法令，有的对华教有利，有的却对华教造成威胁。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每多采纳对华教不利的建议，使到这一段时期的华文教育要面对很大的压力，并且时而出现危机。

1951 年初，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公布《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因建议以国民学校，采用官方语文，即英语和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以取代华文学校和泰米尔文学校的教育制度，导致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群起反对。同时也因此而促成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简称教总），以壮大维护华文教育力量为理由，于 1951 年 12 月 25 日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宣告成立。

另一方面，政府也委任对中国教育有心得的美国人方式(Dr. William Purviance Fenn) 及联合国官员吴德耀研究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教问题，后来撰成《马来亚的华校及华教》(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sians) 或简称《方吴报告书》。这份报告书于 1951 年中发表，主张政府承认华教的地位并协助其发展，使其成为马来亚国民教育的一环。

政府为了综合两份报告书的意见，曾由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检讨巴恩及方吴两份报告书，并拟成报告。这份报告书的内容较倾向于《巴恩报告书》。随后理发议会委托一个特别遴选委员会，起草另一份报告书，并对马来亚联合邦整个教育政策提出建议。这份报告书于 1952 年在立法议会通过。政府也根据这份新的报告书制定了《1952 年教育法令》。新报告书也几乎是《巴恩报告书》的翻版。它强调政府应开办国民学校，以马来语或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至于华校及泰米尔学校则应受鼓励逐渐改为国民学校。华语及泰米尔语只各当成课程里的一科，并且至少要有 15 名同一年级学生家长提出申请，教育部才会受理。这便是马来亚独立前最受华人诟病和反对的报告书与教育法令。

然而，由于缺乏全面开班国民学校的资金，政府不得不另寻执行《1952 年教育法令》的途径。立法议会遂于 1954 年接受另一个特别委员会草拟的报告书，计划在现有的马来学校、华校及泰米尔学校加强英语教学，以使这些学校转型，变成以英语为主的国民学校。结果这份报告书引起华人和马来人的同声反对。同年的 8 月 22 日，马来西亚各州华校董事联合会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代表大会，通过成立马来亚联合邦董事联会总会（简称董总），联合教总，以董教总名义共同维护和争取华教权益，反对不利华教的条文和措施及发展华教。

在 1955 年，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以检讨《1952 年教育法令》及 1954 年教育报告书，以期制定一个能为全民所接受的教育体系。经过 8 次会议讨论之后，遂撰成《1956 年教育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通称《拉

萨报告书》(Razak Report), 在该年 5 月间公布。这份报告书主张以马来语为国

语, 并维护和支持本邦其他各族群的语言和文化发展。

《拉萨报告书》是一份相对较开明的报告书, 但可惜的是, 报告书第 12 条谓

马来亚联合邦之教育政策, 其最终目标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国家教育体系下, 以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 为最终消灭华语、泰米尔语教育埋下了伏线。

立法议会于 1957 年 3 月通过根据《拉萨报告书》的建议所草拟的《1957 年教育法令》。这份法令提到教育政策时, 未将《拉萨报告书》中的最终目标列入。此法令实施之后,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华校的经济困难的问题。

然而, 随着马来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涨, 1960 年 2 月, 政府宣布成立一个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 检讨《拉萨报告书》所提出的国家教育政策, 以及其实施的情况结果。经过调查研究后, 该委员会于同年 8 月正式发表《拉曼达立报告书》, 又称《达立报告书》。依据此报告书, 教育检讨委员会认为《拉萨报告书》的许多计划已在 1958 年至 1959 年之间顺利推行。不过, 该委员会也做出了多项调整建议。基本上, 《达立报告书》与《拉萨报告书》立场大致相同, 即进一步巩固马来语的地位。

1961 年, 立法议会接纳依据《达立报告书》的建议, 而制订了《1961 年教育法令》。此法令重申马来语为国语, 进一步强调马来化政策, 落实《拉萨报告书》所提出的“一种语文, 一种源流”的教育政策为国家教育制度的最后目标。

《1961 年教育法令》强调, 为了国家团结, 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目标是消灭种族性的中学, 以确保各族学生在国民中学与国民型中学里就读。因此, 当时的华文中学必须做出选择: 1) 接受政府的语文教育政策, 以换取全面津贴; 2) 放弃一切津贴, 成为独立中学, 办学经费全部由华人社团和个人捐助。这就是马来西亚现今 60 所华文独立中学(简称“独中”)的历史渊源。

虽然华文教育经常受到教育法令的牵制, 但仍蓬勃地发展, 主要的原因是董总和教总维护母语教育锲而不舍的精神去争取, 以及华社热心支持华教的成果。现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并已拥有一个完善的学校制度。从小学开始到大学阶段, 都拥有一个完整的教育体制, 而且各阶段的评估和考试制度、各阶段的学龄、课程纲要、教学媒介语, 以及教育行政组织, 均有明确的规定。此外, 入读华文学校的, 不仅是华人子弟, 还有其他种族的学生。

正如李如龙(2000)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 马来西亚在教育方面, 政府对其国语马来语比较提倡, 国语教育应在正确的国策的基础上发展, 同时, 还应对其历史差异性进行承认, 马来人教育优先政策的贯彻是合情合理的; 在华文教育的限制上, 阻碍了多民族文化的发展, 不利于人民和国家素质的提升。不过, 由于

马来西亚华人比较自重、自立, 能在多语种的社会背景下选择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道路。在马来西亚华语学校中, 有一批敬业的老师、校长和董事。在华语学校,

教学用语统一为华文，并提倡学生在校园内使用华语，另外，学校还颇为重视国

语以及英语的教学。此种教育方式是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得到家长和学

生的欢迎。

## 2.2 马来西亚主要语言的背景与地位

马来西亚社会的语言虽然不少，但主要的有四种，排序依次为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各语言因其不同背景的缘由，其所具备的地位也并非完全一致，不同地位的语言势必会对国人的语言的使用与学习带来影响。

### 2.2.1 马来语的背景与地位

马来西亚的国家政策规定其国语为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独一无二的官方语言和最重要的语言，其在科技、教育、法律、行政等各方面，均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明文规定马来语为马来西亚国语，且通过国会立法来规定其字体。马来语是基于柔佛廖内的方言发展而来的。马来西亚独立后，国家规定马来文用罗马字母的规则来拼写。马来语和印尼语具有不同的标准，在语法上，现行标准以1956年马来文学与语文大会上的标准为主，其最新拼音则是依照1972年国家出版局公布的规范马来语拼音。

早期的马来语就像其他民族的语言一样，只在相同族群中使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地位低下。马来语教育只到小学阶段，课程强调的是伊斯兰教义和马来文化，而且以爪夷文拼写。1910年的卫司德报告书曾检讨了马来语教育，提出加强教材，培训师资，提倡罗马拼写，进行马来语教育改革，但迟至1957年，马来中学才设立。在1965年，大学先修班才开始用马来语教学，而在1969年前，大学尚未以马来语教学。

马来语也是马来西亚的教育语言。在国家教育政策中，采用国语为教学媒介语是达致国家团结目标的管道。马来语的地位在教育上的大跃进应该追溯到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和《1957年的教育法令》。国家教育制度的最后目标是把马来语提升为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在独立后十年的过渡期内，英语仍然是官方语言。1967年3月3日，《国语法令》在国会三读通过，明文规定马来语是国家语言的地位，而英语失去官方地位。该国法令从同年9月1日起实施，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的唯一的官方语言，从而，使该国成为单语言国家。而且，自1969年起，“马来语”被称为“马来西亚语”，这样，该语言的地位就得到了显著提升。

对于马来语为马来西亚国语这一事实，该国华人和其他非本土人士也表示认同，主要缘于他们对该国的认定，移民社会使华人从侨居的观念转变成了定居。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华人都尊重作为国语的马来西亚语，并且努力地学习。在1970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

年代，能讲、能读、能写国语的华人很多，其中有一些人成绩十分优秀。马来语在学校各阶段使用的成功，不但培养了各种族孩童对居住国家产生了认同感，而且也促进他们互相交往。

## 2.2.2 英语的背景与地位

英语是马来西亚的四大语言之一，地位是第二语言。英语是由英国殖民政府引进的，但是它却没有随英国殖民时代的结束而停止在马来西亚使用。1956年《拉萨报告书》中就清楚地说明英语的地位。英语排名能在各民族语言之上，仅次于马来语，自然有其固有的重要性。二战后，英语已经逐渐崛起成为国际语言。英语已经不是英美等代表性国家的一种母语，它已经独立于各种种族文化甚至跨越它们。英语在马来西亚有其独特之处，原因是它不拥有语言族群，但是拥有不同语言群的不同种族的人却都在使用它。

几乎世界上所有不是讲英语的国家，都把英文作为他们除母语之外的官方语言，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觉得对英语不熟悉的欧洲人等同于文盲。在东南亚，虽然他们的国家把自己原本产生的语言奉为国家官方语言，但是英语在他们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由于东南亚各国的语言差异很大，加之在地方或国际的生活需要连接的桥梁，英语已经被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广泛使用。英语在各个方面如外交、科技等通讯方面，都是作为一种首要的语言工具，同时也是马来西亚与世界各国联系的纽带。

自1967年以来，马来西亚历任教育部长都要求所有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更加重视英语教学，增加讲授英语的课程。在学习上，尤其是在英校或与西方相关的科系而言，英语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桥梁。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英语是作为从事商业贸易的人或者行政管理部门的一种重要的媒介。大多数人甚至觉得，英语是帮助其铸造社会身份，提高经济实力的一个跳板。现实表明，曾经接受过英语培训教育的人所拥有的工作机会比平常人多，他们也更有可能到国外的一些知名企业和上市公司就职。这些公司因为有着较好的工资福利而吸引众多的人，但是它的门槛在于行政事务往往需要英语作为沟通工具。另一方面来说，曾经接受英语教育的人在学习层面深造的机会较多。假如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允许，他们便可出国留学，进而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开阔自己的视野，也增强自己在国内和国际中的竞争优势。

由于马来西亚有着被英国统治的一段历史，所以其英语教育在马来西亚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而且民众对其熟悉程度也较深。在现实当中，华人官员或者马来西亚人已经把使用英语作为一种生活习惯。英语一开始是被一小部分的国家行政人员作为一种沟通工具的，但是后来却演变为人们提升其经济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这使得人们更倾向于报读英文学校，其数量也远比母语学校的人多。但因

为英语学校的学习费用高，人数过多的原因，使得许多人没有机会进入英校。以

上的种种原因，使得英语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3个层面：

1) 英语作为一种科技语言和获取知识的手段，对推动马来西亚社会现代化有

重要的作用。

2) 英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和家庭用语，或者说是母语，对于那些接受过教育的人士，有着中上层社会地位的华人和印度人的家庭有重要影响。

3) 英语作为一种社会认同感，反映了人的心理特征。英语是一个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标志，其原因在于英校一般在城市当中，而且几乎所有可以运用英语会话的人都生活在城市当中。掌握英语被认为是城市的新风尚，中上层社会地位的人大多用英语交流。英语代表着人们的身份地位，在一些公司或商品行业中，掌握英语者备受青睐。

英语承载着现代化的文明，是一个城市的语言，是一个城市对外交流的纽带。在科技日益发达、交流更加频繁和贸易逐渐发展的当今，英语毋庸置疑对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工作起着重要作用。在银行、工程、测绘、商业、医学等行业中，或者扩展到一般的职业晋升方面，英语都是极其重要的。不能很好地掌握英语是造成马来西亚国内的大学生处于失业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英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想用马来西亚语替代它，是行不通的。不可否认的是，马来西亚语作为一种官方语言有助于增强民众的爱国情结，但英语作为一种仅次于马来语的官方语言，更有助于马来西亚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所以，英语在马来西亚的使用不但不会终止，还会获得重视。

### 2.2.3 华语的背景与地位

马来西亚宪法明文保障其他语言的使用，包括华语和马来人之外其他种族的母语，惟只限于非官方用途。任何人都有教导或学习其他语言的权利。独立前夕，华、印裔公民获得保证，各族语言可以自由学习、使用与发展，才接受马来语为国语和作为各族的共通语言。在马来西亚，华语的地位是种族母语。华语是华人的标准语言，也是华文教育的媒介语。此外，华语以及华人方言也是进行华人宗教仪式的宗教语言。在马来西亚，华人有权利接受母语教育、以华语交流、阅读华文报章刊物、进口华文书籍和杂志。在外来移民的语言中，华语有最多的使用者，不过华语的应用受到法令和客观环境的限制。华文教育虽历经曲折，但是仍得以生存。

华语不属于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很多华人社团，如中华工商总会和华校教师总会，为争取华语列为马来西亚官方语言进行了积极争取。然而，他们的这些

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在马来西亚1969年5月10日的大选当中，其执政党遭以重创，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即为语言政策。三天后，马来西亚发生了“5·13”种族